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晨论坛

Forum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0

方法创新与 哲学社会科学发晨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 组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论坛

Forum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0

方法创新与 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 组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组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1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论坛 2010

ISBN 978-7-307-08240-3

I. 方… II. 全…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9089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0 字数:431千字 插页:4

版次: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8240-3/C·270 定价:6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是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办的常设论坛。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2009 年论坛的研讨主题确定为“方法创新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的先导,是理论观点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基础。着力推进方法创新、以方法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就“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进行深入的专题研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学科体系建设、学术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创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必须承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也反映在研究方法层面。当前研究方法方面的弊端表现为多种形式,如缺乏方法意识,不注重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创新;方法陈旧,不能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生搬硬套,不能正确运用研究方法;闭门造车,未能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等等。

当前制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因素比较复杂。主观方面: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比较单一,学术功底和探索精神难如人意,有些文科学者的方法意识不强,也缺少严格系统的方法训练。客观方面:学术氛围比较浮躁,评价体系的指标化、数量化、功利化倾向严重,条件保障比较薄弱,等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之相应,要实现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创新,也应该从各个方面来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我们要通过观念的更新来增强方法创新的原动力,要通过培训和推介来提升学者运用方法的能力,要通过体制的优化为方法创新提供组织和管理保障,要通过评价体系的改进形成科学的科研导向,要通过条件建设为方法创新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要通过良好的学风和氛围来激励学者创新的学术追求。总之,推进方法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依靠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论坛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直接领导下,由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和重庆大学承办。本次研讨活动于2009年11月在重庆举办。武汉大学顾海良教授、天津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张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金勇进教授等著名学者作了主题演讲,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教授作了专题报告。他们对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分别从经典作家学术历程、本学科方法变迁、具体方法介绍、方法创新的制度保障等角度作了深入阐发,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为论坛增色不少。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论坛2010》,是本次论坛主题学术研讨的成果汇编。这些研究或者从学理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进行总体性思考,或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具体学科领域中的方法创新进行深入阐述,或者结合实际对方法创新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还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未能编入,敬请相关作者谅解。

在本书的组编过程中,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领导给予了精心指导,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秘书、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陶军同志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武汉大学出版社朱凌云编辑为书稿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

2010年10月20日

目 录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重读·····	顾海良	1
学术研究中的范式变迁		
——以微观金融学基础研究为例 ·····	张 维	19
抽样调查漫谈 ·····	金勇进	26
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问题 ·····	朱志方	39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形成机制探析 ···	邱均平 谭春辉	51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以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为例 ·····	李申申 吕旭峰	68
中国现代若干理论创新方法局限分析 ·····	吴 炫	90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制约因素		
——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关系研究 ·····		
·····	官留记	107
简论学科研究范式·····	窦学诚	116
方法之疑惑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的几点思考 ·····		
·····	陈 佳 刘晶晶 陈 韵	12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弊端、制约		
因素与创新机制实现之我见·····	贾劝宝 张松柏	144
追寻意义和价值:网络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转型刍议		
·····	张克非	157
典型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组合分析·····	雷 斌	168
论多元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	陈洪澜	178

混合方法研究的模式基础和设计要素	张 培	192
“数字人文”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前沿	王晓光	207
关于艺术学方法创新的若干思考	郭 丽	222
设计研究: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创新	张倩苇	230
交通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陆 礼	246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法	潘 莉	259
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研究	颜鹏飞 丁 霞	274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创新研究	祁春节 李崇光	288
经济学研究的两种基础性方法运用:替代性抑或互补性	杜金沛	316
流动人口在城市分布变动测量方法的创新探讨	高向东	332
组织研究中的元分析方法:改善其效度的视角		
.....	冯 明 任华勇	344
弥补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论缺陷 ——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论析	贾旭东 谭新辉	361
现代情报学研究范式转移与方法创新探析	刘 冰	381
转型中的著作权文化与知识产权法研究方法的反思	肖尤丹	398
法学研究方法论与中国法学的发展 ——一个批判性建构的视角	黄 锬	415
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现状、障碍与策略	杨代福	437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与解困	胡永保	454
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王枫云	465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重读

顾海良*

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同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的先导。方法创新一定是建立在某一特定学科基础之上的，而在思想史上被认可的、有杰出成就的学者，在某一特定学科上的方法创新，更能说明方法创新的意义与作用。据此，我选择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方法创新，作为演讲的主题。

马克思在经济学上有两次重大的方法创新：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的创新，这次方法创新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结构的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者到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的转变，开始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第二次是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关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创新，这次方法创新直接导致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五篇结构计划”的提出和“六册结构计划”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十年之后的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出版，成为马克思在经济学方法创新、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的结晶。

从马克思一生经济学探索过程来看，没有经济学的方法创新就不可能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创新，我认为有十个基本论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一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联性；二是“历史哲学”和“万能钥匙”理解的

* 顾海良，武汉大学校长、教授。

关系；三是“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的关系；四是现象具体和规律一般的关系；五是“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六是总体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的意义；七是“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关系；八是“自行批判”和“历史路标”的逻辑关系；九是“从后思索”：蜘蛛、蜜蜂和建筑师的形象说法；十是“结构”的多义性及其统一性问题。这十个基本论点，大体可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切入点；其次是二、三、四部分，主要讲研究方法；再次是五、六、七部分，主要讲叙述方法；最后是八、九、十部分，主要讲总体上的综合的方法。这些方法论上的创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创新和理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创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联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马克思用了一种“先验的”方法，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以商品这一简单的、抽象的范畴为始基范畴。为了澄清这种误解，马克思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联性问题。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实际上成了说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要义。

马克思认为，他并不是从“先验的”材料出发，而是从实在的经济现实出发的。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研究方法本身包括三个主要环节，这三个主要环节也是研究方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充分地占有材料；二是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种发展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页。

式；三是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经过研究方法的这三个主要环节，就能得出一些思维上的理论结论。接着，把这些理论结论以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马克思认为的叙述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中，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叙述方法的起端，只有运用研究方法得出的理论结论，才有叙述方法的理论阐述和理论体系表达。

反思人文社会发展现状，我们深切地感到，缺乏研究的理论叙述是阻碍理论创新的症结之一，也就是说，理论叙述并没有经过马克思所讲的研究方法的主要环节，在研究方法的三个主要环节上没有付出更为艰苦的科学劳动，就开始“自说自话”地叙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并没有占有更多的材料，也没有分析所有材料的发展形式，更没有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因此，也可以认为，研究方法主要环节的缺失，是阻碍理论创新的症结之一。

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叙述方法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是密切相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成果，不能只有叙述而没有研究，也不能是只有建立在别人研究基础上的叙述，甚至是没有研究的叙述，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有害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也可以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不良学风形成的方法上的根源。

二、对“历史哲学”和“万能钥匙”的贬谪

对“历史哲学”和“万能钥匙”的评说，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说明之一。马克思晚年在欧洲已经有很大的理论影响力和政治感召力，他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陆续翻译成德文以外的文字，在欧洲得到日益广泛的流传。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现象：欧洲的许多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些重要论断看作是一把“万能钥匙”，认为这些论断不管拿到哪个国家或者针对哪种情况都是直接有效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他反对“万能钥匙”的说法。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

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同时指出：“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不存在一般的“历史哲学”，不存在适用于任何历史环境、解释所有各种社会现象的“万能钥匙”。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不存在理解所有这些结果绝对划一的、一成不变的“万能钥匙”，这是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领。同时，“万能钥匙”或者“历史哲学”的这些说法，根本的局限就在于“超历史”。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专门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材料都具有历史性，都涉及历史变化的社会现象。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都是“历史的”科学。就此而言，根本就不存在超历史的“万能钥匙”，也不存在普适的“历史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比较”是相当重要的，要把这些变化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加以研究、加以比较，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汇总，以得出一些研究的结论，这才是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每一专门学科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也提到，假如把他的理论当成一种“历史哲学”，那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他在晚年曾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马克思不赞成把他的理论看成是“历史哲学”，也不赞成把他的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论看作是能够解决好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假如这么做，马克思认为，就会在给他“过多的荣誉”的同时，也给了他“过多的侮辱”。显然，马克思非常清醒地估价了自己理论的有效性，他极不愿意在得到“过多的荣誉”的同时得到“过多的侮辱”。马克思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性在于它在经济学科学革命运用中的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

三、“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的关联及其“中介”

在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中，马克思对“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及其关联问题作了阐述。马克思提道：“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①也就是讲，在对同一类型事物的研究中，比如，在对原始公社的研究中，不能把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像原始公社这样的历史事实，它也同地质层系构造一样，具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等形态，亦即会有不同于一般形态的多种转化形态。我们假如把原始公社中的“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混为一谈，看成是一个无差别的历史事实，就会抹杀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的差别，进而违背历史的多样性的特殊性原则；同时也就抹杀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的转化关系，进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同一性的一般性原则。

历史事实中的“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之间，既存在多样性和差别性，同时也存在可转化性和关联性。“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是“原生类型”的转型，是经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转化形态。在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马克思在揭示李嘉图经济学方法的失误时曾经指出：“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页。

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的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①马克思认为，用圆转化成方这样的问题，在几何学上是可以用法数的方法来解决的，但是方作为圆的转化形态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假如在“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之间，没有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就不可能认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之间存在的是事物的转型关系，对这种关联性的探索，在研究方法意义上，最根本的就是探索事物“转型”的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问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时，马克思从利润、利息等“次生类型”和“再次生类型”等具体形式中，抽象出剩余价值这一内在的、本质的“原生类型”，第一次提出“剩余价值”这一“原生类型”的范畴，从而把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特殊完全区分开来。在马克思看来，“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只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②这里的“第二级的”一词，不仅具有由“原生类型”的生产关系转化而来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在形态上脱离“原生类型”的生产关系，形成更高层次的“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生产关系的意义。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转化形式，不仅说明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源泉，而且还说明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具有更复杂、更具体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就是要探明“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之间的转化关系。“原生类型”和“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之间的转化过程是历时性的，是存在于历史上的中介过程，在现实中这一中介过程不再存在。科学就是要发现这些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只有在研究过程中把这些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加以发现，才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在叙述过程中阐明它们是怎么一步步实现从“原生类型”到“次生类型”、“再生类型”转化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强调对中介、中介过程、中介环节的研究，如果缺乏对它们的研究，叙述过程中的理论及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也就消失了。

四、现象具体和规律一般的关系

现象具体和规律一般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不言而喻，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①马克思的这一说法，同我们通常的理解不一样。在研究中，我们往往用一些经济规律或者一些规律性的表述来直接解释现象。马克思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原因就在于具体现象有着比一般规律更多的复杂的规定性。任何规律都是对具体事物的一般性的、共同性的认识和提炼，很显然，对于具体事物是不能直接用这些规律来解释的，因为这些具体事物有着许多未被规律提炼的、在规律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复杂的因素或规定。我们只有把这些复杂的因素或规定一一加以考察之后，才可能得出可信的适合于复杂现象的结论。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认为经济规律一般能够说明具体事物，说明经济现象特殊。这就是具体现象和规律一般关系问题的基本要求。

在理论研究中，我们是不能用一般经济规律直接解释具体经济现象的。经济规律不能简单地、直接地说明任一特定的经济现象，只有在对某一特定经济现象的具体关系作了更多研究之后，经济规律才可能作出一定程度的“说明”和“解释”。我们不能依靠教科书中的任何经济规律，来直接解决经济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五、“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

“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是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联接关系的表达。关于“具体总体”，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涵义：一个是作为“思想总体”前提和基础的“具体总体”，另一个是作为“思想总体”结果的“具体总体”。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①这就是讲，在“思想总体”之前的“具体总体”，指的是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这种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是事物的本体意义的存在，马克思把它称作“具体总体”。这种“具体总体”是“思想总体”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和根据。当然，“思想总体”经过思维的加工以后再产生的“具体总体”，从思维的规律来看，就是先有直接的表象事物的存在，通过我们的思维对这些具体的形态进行加工，最后在思维中得到反映，然后在思维中表达出来的基于、同时也高于原来那种直观的总体。所以，从“具体总体”存在的直观和表象，到经过思维加工以后变成有序的有系统的“具体总体”，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从研究方法向叙述方法转化的基本过程。

研究过程的关键在于“思想总体”怎样反映“具体总体”，一方面“思维总体”产生于“具体总体”，“具体总体”是“思想总体”的材料和对象，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把先前存在的“具体总体”加工成一种思维中有序的系统的思维中的“具体总体”。在思维中再现的“具体总体”，就是我们讲的理论观点及理论体系。这种“再现”，不是对先前的“具体总体”的简单摹写，而是经过人的思维这一专有的方式加工以后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典的概括：这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①，也就是“叙述方法”。所以，这一“具体总体”并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具体，而是经过思维加工后再再现的具体。“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专门提到的“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需要强调的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方法，只是马克思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叙述方法”。

关于“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也是马克思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

六、总体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的意义

在“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关系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区分总体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用“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这样一些形象的说法来说明问题。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②在马克思看来，“具体总体”是由各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关键因素和非关键因素，其中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将其称为能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和地位的“普照的光”。这一“普照的光”，决定了这一“具体总体”的根本性质。在一定的“具体总体”中，“普照的光”会掩盖其他一切因素的色彩，改变其中存在的各因素的份额和比重，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以太”这一说法，是古希腊哲学家对事物的“原子”的一种指称，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说的构成万物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本元素“气”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决定事物中的根本性的因素是一种“特殊的以太”，这种“特殊的以太”决定着事物的性质，也决定着构成这个事物的各要素的关系。

著名的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关于“总体与个体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的结论就是由此而得出的。卢卡奇的这一结论是在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得出的。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认定了这一结论。这一结论强调了总体的重要性，总体改变着存在于总体中的任何个体的色彩，尽管总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这样的总体，实际上就是研究对象意义上的总体。总体或整体的根本要素就是“特殊的以太”，在对“特殊的以太”把握的基础上，再分析和理解“特殊的以太”之外的次要要素。由此而在理论逻辑上再现一个有序的、系统的思想整体，这是马克思所讲的叙述方法的根本所在。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讲，总体的确定性也就是对象的既定性。研究对象的边界是什么，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没有总体边界的确定，就不可能使自己所研究的事物能在思想总体中得到反映。马克思曾以经济学研究对象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总体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

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总体”或“整体”的说明，包含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象的整体性；二是整体中的决定性因素；三是总体中决定性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即决定性因素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7页。